

浙江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士绅蜕变

——以丁丙为中心的丁氏家族考察

吴 晶 周 膺

【提 要】：中国的绅士阶层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从等级职业结构中分解出来，突破传统的身份矩矱，在新的功能职业结构中转变为多角色的文化主体，以文化先觉或文化自觉主导社会变革，自身也取得更能表达情志、更充分可能的个人和社会实现。杭州丁氏家族以实业、藏书和慈善三大世业重建和改造社会，成为绅士阶层蜕变的典范，也构成浙江文化新世相的典型表征。

【关键词】：绅士阶层 近代浙江 文化转型 丁氏家族

作者吴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 310007）周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 310006）

费正清曾谓：“在过去 1000 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①晚清中国社会转型之际，主导社会变革的主要是士绅阶层，就连一些革命家也具有士绅身份。只是此时的士绅不再单一地为官从政，而是通过广泛的社会流动实现多种身份的转换和跨界从业，以多方面作为实现社会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的蜕变是士绅阶层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文化自觉的结果。日本学者市古宙三因此有辛亥革命为“乡绅革命”之说。^②由于士绅阶层先在地发挥了文化主导作用，使浙江的这一社会转型具有一定先进性，较早且较充分地透露出现代性征。杭州丁氏家族是这方面的经典个案，家族的众多人物突破传统的等级职业结构，并在某种意义上以现代意识引导社会重建，代表了当时浙江一种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

一、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士绅阶层与丁氏家族及其世业的兴起

士绅是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身份大多介于官民之间，有的本身就是预备官员或是致仕官员，是自上而下统治的辅助力量，又是自下而上民意的可能表达者或代表者，所谓“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③。士绅的地位主要通过取得功名或官职而来，获得这种身份的途径又有

“正途”和“异途”之分。前者通过科举考试，后者通过恩荫、功赏、捐纳等。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本来是一种社会分工，然而在“定贵贱，明等威”的专制社会中，其意义被严格的等级身份所湮没，社会系统实际上构成被皇权奴役的封闭的等级职业结构，即在不同的身份等级之下形成的相对次要的职业划分，身份等级才是划分社会阶层的根本标准。各阶层之间的职业划分仅具有相对意义。统治阶层并无职业，而可以通过各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渠道获取绝对多数的社会财富以维持优裕生活。职业划分存在于平民阶层，所谓“先王分士农工商，各一其业而殊其务”^④，实际上只是一种身份禁锢。农工商阶层被束缚在既定职业范围内基本不能流动，世世代代遭受奴役。士绅阶层具有相对可能的流动性，如可以上升为官，也有农工商所没有的特权，如徭役优免、治罪从

¹ ①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②市古宙三：《乡绅と辛亥革命》，《世界の历史》第15卷，东京筑摩书房，1962年。

③徐世昌：《将吏法言》卷五《知事二·礼士》，林庆彰主编：《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24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轻从免、致仕后特别优待等,但流动性也非常小。不少人只能老死于科举之路。

晚清时专制政治开始动摇,科举制度由变易直至废除,固有的超稳定社会结构逐渐打破,士绅面临新的社会选择。浙江这一社会结构新的转化过程可分为前期的等级职业结构弱化和后期的功能职业结构制度化,即因社会不同的功能需求产生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职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各阶层社会地位的确立或社会资源的获得更主要地通过不同的职业来实现。由于专制政权的弱化,财政危机不断加深,专制政权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日趋减少,而特权阶层的数量仍然按旧的惯势继续膨胀,因而贫困化不断加剧。同时,从事新式工商业所带来的庞大利润造就了新的富人群体。旧的身份等级与可获取社会资源量不再成对应关系。特权者的身份因丧失物质支撑价值大大降低。由于功名贬值,绅士也不再有特别的优越性。他们为谋生不得不去寻求过去不屑于从事的职业,有的则可按照性情去实现职业理想。正如清末杭州士人、与丁氏家族交往密切的徐珂说的“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②,社会角色选择比较多样化,并不囿于单一身份。既有演变中的古代的阶级和等级,又产生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裂变的同时也进行着阶级改组,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军人阶层开始成长为新型的社会集团;传统组织不断演化,新的社会群体激增,政治团体、经济团体、社会团体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民社会开始萌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萌发,但始终蒙受农业社会的屏蔽;文化发展也在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徘徊。在此境遇下,绅士阶层不仅大量由农村地主转变为城市工商业主,而且涉足各种新兴行业,尝试各种可能的社会实现。

当时浙江社会的重大变化则为士绅阶层的变异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从经济基础看,过去单一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外来殖民主义经济、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原有的宗法农业经济三种成份的复合体;从政治制度看,过去的权力等级制与权力中心制相结合的专制制度转变为外来政治势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势力和旧地主官僚政治势力三种政治力量的胶着体;从社会心理来看,除了原来的民族性格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又有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心理;从思想体系看,除了传统思想外,又增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社会思潮。在此历史关头,浙江士绅因此有可能较早地进行思想和行为转换,不仅可以在新的社会流动中得以实现个人或家族的成功,而且也推动了浙江的文化转型,从而加速浙江社会变革的步伐。以丁丙(1832—1899年)、丁申(1829—1887年)、丁午(1852—1880年)、丁立中(1866—1920年)、丁立诚(1850—1912年)、丁仁(丁辅之,1879—1949年)、丁三在(1880—1917年)等为代表的近代杭州丁氏家族三代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文化理念主导下的现代产业实践

丁氏家族先祖在清初由绍兴农村迁居杭州,早已具备士绅身份,但直到丁丙这一代才真正崭露头角。这与晚清时期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很大关系。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冲击,杭州遭受了极大的破坏,面临着艰巨的重建任务,而许多旧的士绅家族又在战乱中败落,这就给了丁氏家族以新的机会。丁丙、丁申弟兄均不经意于举业,只是普通生员出身。同治三年(1864年)因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功,经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相荐,丁丙任江苏候補知县,同治六年又加同知衔;丁申受五品主事,赏四品顶戴。丁丙未赴任,在杭州参与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的整个重建工作。他以绅商、藏书家、慈善家等身份,以殊高的社会交往秉赋,对社会资源进行非常广泛地开发,综合利用政府或官绅的权力资源、商绅和商会的经济资源、学绅或文人学者的文化资源、城市工商业者的公众资源以及地方文化遗产资源,十分成功地开创实业、藏书和慈善三大世业,基本恢复了杭州的社会秩序,构成浙江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文化丰碑。丁丙之子丁立中、丁申之子丁立诚考取举人,但最终都专意于世业。丁丙及其后人所维系的三大世业是其家族或个人意志或兴趣,也是近世中国社会之所必须,是经世致用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产物。

丁氏人物较早形成实业思想,是浙江最早实现经济理念现代转换的群体,也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先驱。光绪十五年(1889年)丁丙与南浔人庞元济、杭州人王震元共同筹募股本计白银8.33万两,另借国库白银40.1万两,在杭州拱宸桥西创办杭州通益公纱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投产。该厂厂基面积7191m²,有纱锭15040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产纱200万磅,^①雇用工人1300人。

² ①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七《列传第四十七·傅玄》,中华书局,1974年。

②徐珂:《清稗类抄》第4册《讥讽类·官吏现身说法》,中华书局,1986年。

^{②③}杭州通益公纱厂为原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是浙江民族资本家所创办的最早的现代棉纺织厂,也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三大棉纺织厂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丁丙又与庞元济集资白银30万两,在拱宸桥西如意里创办杭州第一家机械缫丝厂杭州世经缫丝厂,次年建成投产。拥有上海摩宜笃公司制造的意大利在19世纪50年代研制的直缫式缫丝机208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丁丙再次与庞元济合作,集白银8万两在仁和县塘栖镇东日晖桥创建杭州大纶缫丝厂。初置意大利直缫式缫丝机208台,后增至276台,缫丝工200余人。杭州世经缫丝厂和杭州大纶缫丝厂为当时浙江三大机械缫丝厂中的两家。丁氏在创办新式工厂的同时坚持多业并举与新旧整合,特别是仍十分重视服务业发展。不仅从事丝绸业和棉纺业,还继承祖业经商,是当时杭州著名的锡箔商、典当商。由此成功推动家族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转变,实现了自我超越和突破性发展,由旧式商人成长为现代企业家。丁氏创办的现代产业对浙江发展现代经济具有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带动了大批绅商创办新式工厂。在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机器设备、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更有开一时风气之效。

丁氏发展现代产业的目的或为振兴民族工业,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实现,而非简单的功利主义作为。丁丙通过资本积累推动出版印刷业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家之一。丁立中、丁立诚、丁三在、丁仁等在出版印刷业方面续有成就。丁丙开设有丁日升绸庄,他被杭州丝绸界同仁推选为观成堂(丝绸业会馆)正董事。他又在宝善桥仓河下购进高广裕锡箔坊及东河边凉亭,辟为观成堂会员绸货运输专用码头。并以观成堂为基地,推动城市商人“自组织”,建设新型行业文化。丁丙长期主持的杭州善举联合体的运作是在同业行会(商会)的支持或援助下展开的。杭州善举联合体始终为经济开支所困扰,但丁丙从来重视的是其行善功能的更好发挥,努力将经济集合为达善工具,没有将金钱视作人生目标。他甚至将一生的经营收入全部贡献给了慈善事业。在丁丙看来,所有产业在文化意义上都是社会事业,经整合后可以发挥综合效益,它们自身的发展也有赖于同业或跨业优势的整合。

三、从私家藏书到公共文化事业的转型

丁丙祖父丁国典、父亲丁英收藏甚富,到丁丙、丁申弟兄掌家之时藏书益加丰富。丁氏八千卷楼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皕宋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晚清时期的藏书楼一般多重宋元刊本,八千卷楼却以多其他藏本为特色。尤多《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精写稿本、日本和朝鲜刊本以及其他藏书楼藏本等。另外,还收藏了大量西方学人的著作。其所藏不唯珍稀,而特重各种源脉关系,便于专题性学术研究所用。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一书就指出:“清光绪中,海内数收藏之富称瞿、杨、丁、陆四大家。然丁氏于文化史上之价值,实远过瞿、杨、陆。”^①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军队攻陷杭州,丁氏藏书毁损大半。“乱平之后,两先生即奋身以救护图书。复慨然于旧家之中落,益锐志搜求。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节食缩衣,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余年,聚八万卷,较楼额已逾十倍。”光绪十四年(1888年)丁丙弟兄检校家藏之后在杭州城东头发巷丁家故庐外扩建藏书楼5楹。因此前两弟兄搜求四库散佚、复兴文澜阁之事上闻于朝廷,光绪七年(1881年)朝廷曾下诏有“洵足嘉惠士林”之褒,故以“嘉惠”为藏书楼的堂名。堂之上为八千卷楼,储《四库全书》著录之书近3500种。以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著录书1500余种分藏楼之两厢。堂后又筑室5楹称后八千卷楼,规模与八千卷楼相同,储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较后所出未著录书8000种。《古今图书集成》《全唐文》同藏于此。另还收藏有其他如释道藏、传奇小说、制艺类等书。另辟一室于堂西,上下3楹,曰小八千卷楼,又曰善本书室,专藏善本2000多种。其中宋元刊本200余种,“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整比朗列,难更仆数”,为藏书精华之所在。^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即丁丙歿后8年,由于支付慈善巨款留下亏空,再加上丁氏裕通银号温州分号经营亏空,丁家只得变卖藏书。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倡议建立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即现在的南京图书馆,委派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缪荃孙为总办(馆长)。缪荃孙与丁氏

³ 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91页;《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杭州口,载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②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186页。

⁴ ①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民国17年(1928年)。

②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民国21年(1932年)。

素有交往,征得端方的支持,以7.3万元收购丁氏全部藏书共1.5万多种、20余万卷,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或是永久的慈善遗产。稍前南宋楼藏书已收归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人此时正耽耽于丁氏藏书。所以这也算是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的理想归宿。

丁氏在广阔视域下的版本学、目录学整理与研究成就卓著。先后编纂八千卷楼藏书总目《八千卷楼书目》、小八千卷楼藏宋元刊本总目《善本书室藏书志》、新书目《嘉惠堂新得书目》等,将中外收藏集合于一体进行专题性的目录学阐释。不仅提高了版本学、目录学的实用辨识性,而且萌发了现代版本学、目录学意识。《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著录所藏善本秘籍2654部。其中宋元旧槧142种,明刻本1163种,抄本(明抄、影宋元抄、精抄、旧抄、名家抄等)1110种,近刻近抄本181种,稿本24种,日本、高丽刻抄本34种。所选既精约又十分广博。柳诒徵曾说:“所藏之书多日本、朝鲜刊本,可征域外刻书风光。”^①《善本书室藏书志》以及《八千卷楼书目》还十分完整地著录当时出版的各种西学汉译著作。在漫长的东亚文化交流互动历史中,中国曾是巨大的输出源,周边藩属国如高丽、日本、越南扮演着被动、隶属的接受者角色,“天朝上国”的民族意识、“文化宗主”的文化情结根植于国人心中,往往不能超出即有范围以宏观、全局的眼光去审视自身的文化。晚清以后,面对文化交流中话语权旁落的历史困境,丁氏较早将传统文化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域外,由文化自恋转向文化自觉。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崇尚西学、摒弃儒学的风潮骤起,作为旧学载体的汉籍成为落后的象征而被鄙弃。“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②其中六朝、唐抄本和宋元旧槧许多为中国久佚的孤本,也一度呈无序流动之态势大量涌入书肆。这些汉籍回归中土,为丁氏的文献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域外文献力求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体现了一种从学术演变中认识和总结典籍发展规律的精神。这非但有助于探讨中国典籍向东亚文化圈流布的轨迹与形式,也有助于研究东亚各国对汉籍的保藏与吸收情况,客观估计汉籍对东亚社会生活发展在各个层面的作用和影响。该书还依据版刻自身的序跋、版式特征、前贤记述、避讳字等,运用多种校法对存有阙疑的域外文献版本加以甄别,期冀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鉴别日本刊《御注孝经》,首据“首题《御注孝经》序”“卷尾有文明十八年(1486年)桑门祥空跋”及“享禄辛卯苾刍尧空跋”,次依版式特征“次行署‘左散骑常侍兼丽政殿修国史、上柱国、武强县开国公臣元行冲奉敕撰’。序后另行顶格题‘孝经’,越一格题‘御注’;次一行列‘开宗明义章第一’。经文大字,注文夹行。卷末间一行题《御注孝经》”,断言是为本为“逍遥院内府实隆公真迹”。^③又根据正史、地方志传记详实著录著者履历,其中也包括外国著者。如《桂苑笔耕》的著者高丽学者崔致远的小传涉及字号、功名、宦历、著作、行迹等,精细得令人叹为观止。丁申《武林藏书录》则详录杭州藏书源流,资料十分丰富。卷上记北宋至清官家藏刻、采集书籍之概略。其余卷中、卷下和卷末3卷记历代私人藏书。起自三国吴人范平,迄止清代杭州学人朱学勤,凡70余家。杭州一带古籍流传及宋元刻书优点、书商作伪等也有详载。此书为杭州藏书最为详实的记录之一,于版本研究有颇大助益。丁立诚协助丁丙、丁申藏书和出版,在京求学时常光顾书商李雨亭的宝森堂搜求善本,并学习辨识技能。樊增祥《小槐簃吟稿》序称:“又见于书估李雨亭。许观其抽览群籍,辨析版本,心知此君邃于目录之学,匪直能文而已。”^④缪荃孙则称丁立诚于“目录之学,如瓶泻水”^⑤。丁氏藏书《改虫斋诗略》、明写本《孝经总函》《武林金石记》等均均为丁立诚购于北京。

丁氏是中国最早形成公共图书意识的藏书家,也是中国地方文献整理刊印最具成就者。丁氏没有像一般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书深藏高阁、秘不示人,而是加以充分利用以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其藏书楼面向各地学子开放,几乎有求必应。杭州府学尊经阁因太

^① 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1928年。

^②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续修四库全书》第9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经部六》,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4卷,周膺、吴晶、周密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④ 丁立诚:《小槐簃吟稿》,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武林丁氏家集》,周膺、吴晶、张金辉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⑤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辛壬稿卷二,昌彼得句读,文史出版社,1973年。

平天国战乱藏书损失殆尽，丁丙拿出家藏复本来充实。战乱后丁家购得其他藏书楼失散珍本，往往完璧归返。丁丙听说阮元的镇江焦山书藏尚有 4 个书橱空着，就拿出家中所藏珍本 451 种及缮目 1000 册赠送。浙江巡抚马新贻提议在杭州设局印书，同治六年（1867 年）委托丁丙筹建浙江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后来改为浙江官书印售所，宣统元年（1909 年）并入浙江图书馆。其所刊大多以八千卷楼所藏为底本，精品辈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嘉惠堂也是著名书局，以藏书优势系统出版各类古籍。主要刊印了《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西泠五布衣遗著》《西泠词萃》《当归草堂丛书》《当归草堂医学丛书》6 种丛书。这些著作的出版，使杭州成为中国地方文献保存最为完整系统的城市。《武林掌故丛编》计 26 集 187 种，存世较成熟的相关典籍差不多应收尽收，内容涉及制度名物、城郭宫室、山川道路、人物事迹等，为杭州乡邦文献之百科全书，至今仍是极为完备的杭州研究史料。正如十分看重丁丙的俞樾在《武林掌故丛编》里说的：“疆域之形势，耆旧之言行，民俗之沿习，物产之流通，儒林文苑之所传留，僧庐道观之所缘起，无不见于此编……（两丁君）博观精选，成此巨编。言武林掌故者，舍此何观焉？”^①《武林往哲遗著》丛书 50 余种 66 册，是最全的杭州人物著作集成。丁立中补辑 10 种，刊成 32 册，为《武林往哲遗著》后编。《西泠五布衣遗著》丛书收录清初杭州五位文人金农《金冬心先生集》、吴颖芳《临江乡人诗》、丁敬《砚林诗集》、魏之琇《柳州遗稿》、奚冈《冬花庵烬余稿》5 部著作。《西泠词萃》收录六位杭州词人宋周邦彦《片玉词》、姚述尧《箫台公余词》、朱淑真《断肠词》，元仇远《无弦琴谱》、张雨（张天雨）《贞居词》和明凌云翰《柘轩词》6 种词集，其中姚述尧《箫台公余词》极罕见，仇远《无弦琴谱》道光年间（1821—1851 年）始从《永乐大典》辑出。《当归草堂丛书》收录《童蒙训》《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慎言集训》《温氏母训》《松阳抄存》《切近编》《张杨园先生（履祥）年谱》《枕行录》等 8 种书。《当归草堂医学丛书》为子部医家类丛书，收有《颅凶经》《传信适用方》《卫济宝书》《太医局诸科程文》《产育宝庆集方》《济生方》《产宝诸方》《急救仙方》《瑞竹堂经验方》《痰虐论疏》《铜人针灸》《西方子明堂灸经》等 12 种书。

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散毁。同治元年（1862 年）丁丙弟兄发现后全力抢救。不仅收集市肆之书，还集胆壮者数人将所剩者全部运抵位于留下的家庙风木庵。后又移至上海。并托书商周汇西借惜字名继续搜求。同治三年（1865 年）杭州克复后将抢救所得总计 8689 册约占原藏 1/4 的阁书（另有《古今图书集成》残本 673 册）运回城内，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自同治五年至十年（1866—1871 年）又搜求得 300 余册。同治六年（1868 年）浙江巡抚谭钟麟与丁丙共商重建文澜阁，指定丁丙、应宝时主持其事。光绪八年（1882 年）丁丙倡议并主持、前后历时 7 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缺卷、缺书工程启动。其初期的底本主要是八千卷楼藏本，后来丁丙又出面向各地藏书家借用底本。“更复广为采求，尽瘁以赴。中经艰难，矢志不渝。用使琳琅巨籍，克复旧观。有于天一阁、抱经楼、振绮堂、寿松堂诸藏书家，按籍征求。求而未得者仅 90 余种。”^②据《文澜阁志》卷下王同《文澜阁补书记》所记，至光绪十四年（1888 年），除八千卷楼原藏 331 种外，共编配残篇 891 种，补抄 2174 种，合订 34769 册。^③后又补 38 种（含《古今图书集成》《钦定全唐文》等文澜阁其他藏书）。大体成就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原有规模。后经钱恂、张宗祥主持，至民国 12 年（1923 年）全部抄成。《四库全书》对原著篡改甚多，补抄本文澜阁《四库全书》很大程度上进行了还原，有独特的价值。在补抄《四库全书》期间，丁丙还做了其他许多事。如为文澜阁配全《古今图书集成》，并捐赠《全唐文》260 册。光绪十五年（1889 年）又捐赠从海外购得的日本版《大藏经》。另检八千卷楼家藏佛经藏于花坞的眠云室，创花坞经藏。

四、学术研究和艺术实践的社会功能和现代取向

丁氏人物在从事各种事业外也有大量著述，有的还成为专业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作并非事业或人生之余事，而是一种述善表达。以信仰为本底，以行善为实现目标。丁丙对佛教真信仰真践行，不仅修复了无数佛教设施，而且终身以佛教参验自己的事业。他是一代大实业家，但在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这方面情况，丁立中所撰《先考松生府君年谱》也只字不提。这似乎是丁氏家族生活理念的一种反映。即始终坚持以行善为本，而不以谋利之经济逐本。丁氏著述可分目录类、题跋类、掌故类、传记类、诗词类等几种，均以述善为内涵，字里行间始终围绕一个“善”字。朴素灵性的诗文基本以直接的述善为指归，文献整理或史志性著作也以利益方

^① 俞樾：《武林掌故丛编》序，嘉惠堂丁氏刊本，清光绪九年（1883 年）。

^② 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 1 卷第 7、8 期合刊，民国 11 年（1932 年）。

^③ 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载丁申、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 26 集，嘉惠堂丁氏刊本，清光绪九年（1883 年）。

便为宗旨。孙树礼《善本书室记》尝谓：“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今松生年丈为进一解曰：积书十一，积善十九。则其所锱累寸积者，岂特善本书二千余种哉？”^①这同样也是其著述之本旨。丁立中撰辑的丁丙纪念文集《宜堂类编》收录的一些纪文感叹丁丙忙于事务，著述不多。而实则丁丙一生著述不断。早年写过《读礼私记》《礼经集解》《松梦寮诗稿》《松梦寮文集》等，后又陆续写成《九思居经说》《说文部目详考》《说文篆韵谱集注》《廿四史刻本同异考》《武林金石志》《宜堂小记》《于公祠墓录》《北郭诗帐》《北隅缀录》《乐善录》等多种著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次年春天，丁丙在病榻上最后编纂了一部被日本学者夫马进誉为“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这一点是其他资料无与伦比的”^②史料集——《乐善录》。丁立中遵从他的遗嘱继续进行补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版。丁立中跋语云：“先大夫秉性淡泊，书籍外寡所嗜好，生平精力均消耗于善举之中。戊戌孟夏从事斯编，粗创条例，时身已积劳病矣。药炉茗碗之外积牍丛叠，甚至枕函左右，充塞均满。”^③《乐善录》详细纂述了杭州慈善史以及晚清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建置、资产、规约、捐输、度支、人物等，是中国慈善史上最完整也极为珍贵的经典文献。

丁氏之述善著述也具有实证性书写特征。丁午年仅28岁即去世，但已成就相当的文字学功底。其《试帖存稿》(经说)、《重文》等著作考订精深。又辑有《龙井显应胡公墓录》《扬清祠志》《湖船续录》《城北天后宫志》《紫阳庵集》等多种史志性著作。《试帖存稿》(词赋)则既具灵性，也多纪实。丁立诚之《王风笺题》写于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咏京华风俗而感事愤世，语多讥讽。由于生前不便付梓，民国9年(1920年)才由徐珂笺注、丁立中印行。丁立中《王风笺题》跋云：“先兄客京师久，前后公车凡九上。”暇时为诗。“往往于世风之变易、朝政之得失，不免有所感触。寓讽于规，怨而不怒，有《小雅》《离骚》之旨焉。诗既成，人争诵之。”^④丁丙晚年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是《武林坊巷志》。该书对杭州800余条街、坊、巷、弄“稽之图籍，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⑤。俞樾《武林坊巷志》序称：“博采群书，参稽志乘，无一事不登，无一文一诗不录。城郭、官府、宫室、寺观、坊市曲折及士大夫第宅所在无不备载。”^⑥所征引的文献资料达1600余种，构成中国最大的一部都市志。丁丙于编纂此书极为慎重，再三考订仍不肯轻易定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病重时将书稿交托友人孙峻，请其详加审核补订。丁丙、丁申辑《国朝杭郡诗三辑》继吴颙《国朝杭郡诗辑》和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后，继续收集编辑道光年间以后杭州诗人及这之前没有收入的清代杭州诗人作品，凡100卷，超过前两辑规模的总和，共收录4785人的作品。吴庆坻序称《国朝杭郡诗三辑》“博采道光以来之诗，而前百余年为旧本所未采者并补录焉。庚辛之难，抗节者众，别为四卷，以阐潜德。八旗驻防历二百年，人文炳然，甄录所作，以彰国家教养培育之厚。人系以传，一如前例。左采而右获，晨抄而暝写，盖二十年而始成”^⑦。此书也是《光绪杭州府志》极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丁丙为修纂《光绪杭州府志》也做了不少工作。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就向知府龚嘉儒建议重修府志。在编纂过程中以家藏书供编纂人员参阅，而且经常与他们讨论有关史实考订问题。初稿写成后，坚持要求再度详加审订，因而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才定稿，但因丁丙去世迟迟未能付印。民国11年(1922年)在陆懋勋、吴庆坻补上清末10余年的史事后才出版。丁立诚六子丁以布

⁷ ①孙树礼《善本书室记》，载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附录，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4卷，周膺、吴晶、周密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②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64页。

③丁丙：《乐善录》跋，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3卷《武林丁氏家集》，周膺、吴晶、李艳涛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④丁立诚：《王风笺题》，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武林丁氏家集》，周膺、吴晶、张金辉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⑤丁丙：《武林坊巷志》丁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⑥俞樾：《武林坊巷志》俞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⑦丁申、丁丙辑：《国朝杭郡诗三辑》，钱塘丁氏刊本，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曾以国子监典籍之职参与修订。

丁氏人物大多具有敏锐的文学艺术感觉,艺术修养很高。丁丙、丁申、丁立诚、丁立中、丁仁、丁上左、丁三在、丁以布等祖孙三代不仅精通诗文金石书画鉴赏,而且均善创作。且风格典雅端庄,富有才情,一如其人。丁丙诗宗浙派厉鹗,所作以“清”“雅”见长。格调幽隽清绮、婉约淡冷,蕴意纯正高洁、钩深摘异。一生作诗无数,惜随作随弃,存留不多。所作《松梦寮诗稿》《菊边吟》《北郭诗帐》《续东河棹歌》《三塘渔唱》或感怀绵深,或如史诗。丁立诚则独具诗人个性,8岁即能吟作。后随丁丙遍游名胜,搜讨掌故,而以诗记之。与吴兆麟、王景彝结铁花吟社,与许增、李辅耀创“清尊雅集”。吴庆坻《小槐窠吟稿》跋称:“君感怆今昔,复愤切时事,所作多苍凉激楚之音。”^①丁立诚还精通律吕,为杭州府学修复礼乐,又考订武舞谱。这种音乐修养也使他的诗更具美感。丁立中、丁上左、丁三在、丁以布先后参加中国晚清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在文学上颇多作为。丁立中以博物掌故诗见长,所作构成一种诗史。李鹏飞《禾庐诗抄》序云:“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藏,身之所遇,一切发挥于诗,以寄其怀抱。诗才日肆,诗律日严。不名一家,卓然自立。”^②丁丙继室凌祉媛也颇具诗词天赋,著有《翠螺阁诗词稿》(诗四卷,词一卷),所作多性灵,且能表达女性的时代感受,可惜早卒。丁丙、丁申的妹妹丁莲君能诗文。丁丙、丁申均能书善画,对金石篆刻也有很深研究。丁丙的两位女儿丁立延和丁恒善画。丁仁以书画为业,捐献杭州孤山祖产与叶铭、王昶、吴隐等发起创办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是研究印学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丁仁治印宗法秦汉印和浙派新风。在甲骨文书法上取得较高成就,既是开创者,也成卓然大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端方奏请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丁三在担任浙江出版协会理事,又独资创办杭州图书局从事机器印刷和图书经营。其所印书在南洋劝业会获得嘉奖。民国4年(1915年)又创聚珍仿宋铅字体于上海,开发了一种实用艺术字体。初以黄杨木顶丝刻字,由于费工多乃易木为铅。他还把创制手续写成《考工八咏》。不意功未及半而辞世。后赖有丁仁董理以竟其志,民国9年创成欧体仿宋聚珍活体方形和夹注用长体两种铅字模。并创办聚珍仿宋印书局。聚珍仿宋印书局于民国10年(1921年)归于中华书局,丁仁任中华书局监察、古书部主任、聚珍仿宋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认为仿宋字精雅,所印之书直可与明清翻宋仿宋诸精架媲美,乃与同人商量用它辑印《四部备要》,并由高野侯主持、丁仁监造。中华书局刊印的仿宋字书风行一时,商务印书馆急起直追,另制了一套仿宋字。

丁氏人物还整理了大量艺术文献。杭州府学原有宋理宗书写的《道统赞》碑石 13 方,修复府学时发现少了一方《文王赞》,丁申用其他 12 方碑石刻字偏旁拼成补刻了《文王赞》。后来原碑找到,二者共同保存于杭州碑林。丁丙曾收藏西泠八家印 355 方,辑成《西泠四家印谱》(附存四家)12 册。又将汉铜印 136 方印成《当归草堂汉铜印存》。清倪涛《武林石刻记》、丁敬《武林金石记》皆未成稿,丁丙得其残帙,并加重搜采,编成《武林金石记》。丁仁光绪三十年(1904 年)辑印《泉塘丁氏八家印谱》,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辑印《杭郡印辑》,民国 14 年(1925 年)辑印聚珍仿宋版《西泠八家印选》。民国 5 年(1916 年)辑《秦汉丁氏印谱》,后辑续集。丁丙藏有《苏氏集集古印谱》《考古正文印藪》《古印选》《赵凡夫先生印谱》《四香堂摹印》《印征》《铜鼓书堂集古印谱》《续古印式》(及重修摹本)以及《汉铜印谱》《画梅楼摹古印存》《汉学斋仿古印谱》等,丁仁剪粘裱册,以每页印十余枚辑成《鹤庐集印》。又辑《悲庵印剩》《印海初集》《印海续集》等。民国 26 年(1937 年)与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合辑《丁丑劫余印存》。丁仁收藏不限于印,兼及浙派诸家之书画、书信、书籍等。后多归于无锡巨富华笃安,今藏于上海博物馆。该馆精品不少为丁氏旧藏。

五、杭州善举联合体与社会公共事业建设

清代中后期,以丁丙为代表的热衷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杭州绅士创办经营了被夫马进称为中国最大慈善组织的“杭州善举联合体”。这个组织的核心是普济堂、同善堂和育婴堂,经营管理约27个机构,功能基本涵盖政府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其存在

^① ①丁立诚:《小槐窠吟稿》,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武林丁氏家集》,周膺、吴晶、张金辉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②丁立中:《禾庐诗抄》,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武林丁氏家集》,周膺、吴晶、张金辉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的约1个世纪里,除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运营没有终止。普济堂设怡安堂(养老院)、清节堂、正蒙义塾、施药所、栖流所、恤灾所、给米所等部门。清节堂收养70岁以上无依靠寡妇,栖流所收容旅行途中不幸患病者,恤灾所安置火灾灾民,给米所是普济堂满额而向无法收容的老人发放粮食的设施。同善堂设立比普济堂晚许多,左宗棠重建于同治三年(1864年),委托地方政府与丁丙等绅士共同经办。设施材局、掩埋局、施医局、牛痘局、报验局、穗遗集、钱江救生局、正蒙义塾、借钱局、惜字会等部门。掩埋局掩埋战乱死亡者,施材局制作和施舍棺材,施医局即医药局,牛痘局负责接种牛痘。施医局每天为1000多人诊视,牛痘局每年为1000多人种痘,掩埋局每年埋葬尸体3000多具。报验局(报验所)是验尸机构,穗遗集对守寡但有公婆子女需要照顾一时无法入清节堂的妇女进行援助,钱江救生局负责钱塘江救生和浮尸打捞,借钱局向贫穷者无息贷款,惜字会将写过字的纸张收集起来郑重焚化。育婴堂除收养孤儿外,还寄养极度贫穷之家婴儿。三堂而外杭州善举联合体还管理三仓(永济仓、义仓、富义仓)、宗文义塾、钱江义渡局、保甲局、迁善所、粥厂、丐厂、浚湖局、救火义集等机构。钱江义渡局鼎盛时年渡客达4000多万人次。保甲局负责城市治安联防巡逻和启闭栅门,迁善所收容教育轻罪或犯错者,粥厂在冬季或饥谨时向贫穷者施粥,丐厂为相对固定的乞丐栖息所,浚湖局负责疏浚西湖,救火义集是民间消防组织。义塾分正蒙义塾和宗文义塾。普济堂创办时即设正蒙义塾,太平天国战争后合并其他一些义塾改编为新的正蒙义塾。同治四年(1865年)分置于普济堂和同善堂。前者7斋为低年级下塾,定员93人;后者6斋为高年级上塾,定员56人。免费收教无依靠少年。宗文义塾创自嘉庆年间(1736—1820年),设5斋,每斋10人,收旧家子弟才堪造就、无力从师者。《乐善录》卷八《表传》中罗列了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65—1898年)30多年义塾生成为生员以上者名单。其中出身于正蒙义塾的生员279人,举人4人,进士1人;出生于宗文义塾的生员152人,举人3人。

晚清杭州的慈善机构还自州府向县城、镇乡乃至村延伸,同时其事务也自内而外延展。自上而下的分布使慈善事业社区化,其受益对象以地域群体为主。外延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留外地服务对象,如杭州育婴堂曾收留桐乡县青镇留婴堂、海宁州硤石镇接婴公所送来的弃婴。还到建德、淳安、遂安等县收养难民。二是赈灾捐款。光绪四年(1878年)河南、山西发生严重旱灾,杭州绅商协助政府展开赈济,在同善堂设立协济豫赈局,在学宫设立协济晋赈局,筹款白银数十万两。光绪五年(1879年)黄河决口,畿辅泛滥,被灾人口不下数千万。丁丙会同绅商于同善堂设赈局,捐白银3000两为倡,并广为劝募。计解直隶白银十余万两、棉衣5000余件。

就社会功能而言,杭州善举联合体已经大大超出传统的慈善救济范围,如怡安堂、穗遗集、义塾等属于社会保障范围,迁善所、保甲局、浚湖局、借钱局、救火义集等更是政府行政职能。某些慈善救济措施虽然在明清之前已经出现,但并无专门机构常年经营,如栖流所、恤灾所、施材局、掩埋局等。杭州善举联合体要解决的问题是晚清社会转型、市民社会萌芽、城市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问题,实际履行了当时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行政职能。这个组织有中国古代佛教组织形态、家族事业形态(义庄)和民间组织形态之后最新最先进的组织形式,吸收了西方现代慈善组织的先进理念。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指出:“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当今的都市行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活动几乎涵盖了居住在这一城市的居民的各个方面。”“杭州善举联合体是处理都市行政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了。”^①其工作人员达1000人左右。内规模最大的保甲局雇用的更夫、栅夫即有370余人。到19世纪末,每年的总支出约10万缗,换算成白银约6万两。领导这个机构或这项事业的是被称为善举董事的群体。善举董事也称善举绅士或绅董,他们都是有钱的地方绅士,即绅商。其层级由善举总董—各堂(局、集、仓等)董事—司事3个层面构成。《乐善录》卷八《表传》所列绅董表载记21位总董、170多位堂董、160多位司事以及130多位粥厂和保甲局绅董的姓名籍贯。21位总董是王泰、胡光墉、吴恒、徐恩绶、沈映铃、应宝时、陆檀、金曰修、叶葆元、丁丙、吴凤喈、庞云鎔、王同、高云麟、王震元、陈宝淦、庞元济、金承诰、吴寿昌、应德明、陆家骧。他们的籍贯除胡光墉和应宝时、应德明父子以及庞云鎔、庞元济兄弟5人外,其他都是钱塘县和仁和县。善举总董完全是志愿性、义务性的,不取分文报酬,与当代的“志工”“义工”相近似。下辖各机构的董事及众多的职员、雇员等则付给薪酬。善举总董的功能相当于市长,但非但这个“市长”不领薪,而且他领导的“市政府”完全依靠民力运作。巨大的资金缺口由“市长”赔补。夫马进认为这种善举带有徭役性质,善举总董实际上成为“徭役编审”。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善举总董垫付善款巨大,当时有人预测“恐将来董事视为畏途”^②,事实上丁丙之后没有人愿意接替此职。以致丁丙担任了15年善举总董后,在别人轮值时实际上仍主持工作、填补经营亏空,总计31年之多。据成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杭州善堂文稿》记载,丁丙退任总董直到去世前1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杭州善举事业的运营亏欠赤字绝大部分仍由丁丙填补,而且数额远比他担任总董时垫补的3万缗加利息共计约7.5万缗为多,仅光绪十三年以

后逾即10万缗。⁹丁丙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民生,成为堪与当时西方教会慈善家相比乃至有所超越的一代大慈善家,其伟大人格和道德情志构成了今天都难以超越的历史丰碑。

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恢复,主要也是丁丙整合各方面资源并亲历亲为的成果。他先后集资重建断桥、庆春桥、宝善桥,建横河桥、普济桥、坝子桥、德胜桥、万安桥,疏浚西湖、临平湖、北湖、南湖、城内河道、驻防营河道、西溪河、沿山河、东河,修海昌堤坝、转塘、上河堤坝、奉口斗门,重修湖心亭,修复湖墅水龙(消防龙头)等。还主持筹集西湖岁浚经费,以使西湖得到经常性疏浚。又修复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3所官学以及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4所书院。由于敷文书院地处万松岭荒僻之处,又在城内别创敷文讲学之庐,并开设正蒙义塾和湖墅社学。重修学政考棚,并购置地基为贡院建造供考生暂憩的棚厂。又设立丁祭局,集诸生供洒扫、治祭器,考订礼器乐器,恢复祭孔之仪。修复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章墓、孙惟信墓等,并为清代浙江督抚大臣左宗棠、蒋益澧、杨昌浚、彭玉麟、谭钟麟等建了一大批生祠。有人发现一批元大德年间(1295—1307年)铸造的编钟,他专门建元音亭贮藏。得到一些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的贝叶经,送至灵隐寺保存。得到一批吴越国铸造的金涂塔,送与灵隐、净慈等寺保存。俞樾辞官后长期寓居杭州,担任诂经精舍山长。光绪十三年其寓所俞楼第一楼不戒于火,丁丙为之重建,且增建了式古堂。俞樾的一些著作,如《群经平议》《俞楼诗记》《琼英小录》等也是丁丙出资刊印的。

俞樾在《丁君松生家传》结语中特别指出:“余既为君立家传,乃论其后曰:杭城克复以来三十余年,湖山歌舞粗复其旧,固由诸大吏振兴于上,贤有司经画于下,而拮据搢搢、心口交瘁、羸没从事,使公私交受其益者,则君一人也。君有官不赴,伏处乡里,而惠泽被乎四方,声名动乎朝野。求之古人,未可多得。微论刘胜寒蝉不堪比拟,即王烈、阳城辈,徒以德化其乡者,亦不能尸居龙见若斯也。君临终有诗云:‘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夫子自道,得其实矣。”^①俞樾强调丁丙的特殊贡献不无道理,而事实上丁丙还带动了一大批绅商包括他的整个家族来共同完成重建杭州的宏伟目标。丁氏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已经超越于家族,成为士绅社会的一分子。丁丙的事业离不开兄长丁申的全力配合。丁立中尝言:“凡所办事皆先伯父所欲为,或先伯父倡于前而府君和于后。”^②太平天国战乱后,丁立中与人借维修府学和仁和学堂之机重修了南宋民族英雄陈文龙土谷祠和陈文龙墓。宣统元年(1909年)王达甫、蒋延桂等集资购置田家园艺宅20亩地异地重建观成堂,丁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丁立中还兴办了观成第二简易小学堂等公益事业。上述善举总董及其他绅士也都有行善意志,而丁丙的模范行为在更广大的范围里感化着社会大众,包括各任地方官。尽管还十分初步,但就具备社会公意而言,丁氏家族成员以及杭州善举联合体的众多支持者构成了早期公民社会的雏形,将个人、家庭、家族都融合到这一系统中去。

⁹ ①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75、516页。

②《善举盐捐案》护理两浙盐运司使、杭州府知府张,浙江按察使祁,浙江布政使继,两浙盐运使司周,分巡杭嘉兴湖海防兵备驿政道常为济贫积谷以垂久远事(清道光六年三月谷旦)。

③万方:《慈善之痛:国家权力下的清代民间慈善事业》,《书屋》2007年第1期。

¹⁰ ①俞樾:《丁君松生家传》,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1卷丁英、丁庄、丁士元纂,丁申、丁丙、丁午修,丁立诚、丁立中续修:《丁氏宗谱·传略》,周膺、吴晶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

②丁立中:《宜堂类编》卷二《先考松生府君年谱》第四68岁3月条,载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周膺、吴晶点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